



● 作者/Michael W. Major ● 譯者/袁 平 ● 審者/黃坤銘

對馬戰鬼或小林丸？

Ghost of Tsushima or Kobayashi Maru? Japan's Problematic Preoccupation with Decisive Naval Battles in World War II

取材/2022年第3季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3rd Quarter /2022)

二戰期間，日本對決定性海戰的偏執迷戀，在中途島、菲律賓海與雷伊泰灣等三場戰役中深切體現。而前述三場戰役，日本接連失利，在太平洋戰爭一蹶不振，更是說明因循守舊無法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1905年對馬海峽海戰開戰時，日本帝國海軍東鄉平八郎(Tōgō Heihachirō)大將在旗艦三笠號(Misaka)艦橋上方的羅盤甲板指揮若定。(Source: 1906年2月東城鉦太郎[Tōjō Shōtarō]繪製油畫)

1904年，大日本帝國（以下簡稱日本）這個蕞爾島國與大陸國家俄羅斯帝國（以下簡稱俄國）開戰，全世界都預期日本將會一敗塗地，因為之前未曾有亞洲國家打敗歐洲現代帝國主義國家。而結果出乎全世界預料，日本在衝突期間幾乎贏得每場戰役。¹ 1904年8月10日，日本在黃海海戰中大敗俄國艦隊，這是日本在海戰中首次取勝，俄國戰敗後，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組建第二太平洋艦隊(Second Pacific Squadron)，該艦隊由11艘戰鬥艦(Battleship)、8艘巡洋艦(Cruiser)，以及來自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9艘驅逐艦(Destroyer)組成，許多人認為此艦隊成軍後，武力平衡將傾向俄國。1904年10月，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啟航前往遠東，航行超過18,000哩後，在對馬海峽(Straits of Tsushima)與日本帝國海軍交戰，² 俄軍在這場戰役遭到重創：艦艇21艘沉沒、6艘被俘；官兵4,380名陣亡、5,917名被俘。³

日本帝國海軍在對馬海峽大勝，逼著俄國坐上談判桌。然而，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如此壓倒



1942年6月4日，美軍航空母艦約克鎮號(USS Yorktown)在中途島戰役中遭三枚日軍炸彈擊中。(Source: USN/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illiam G. Roy)

性海戰勝利，最終卻導致日本軍方領導人在近40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陷入偏執，步上衰敗命運。由於日本不斷試圖在對美作戰中，複製此種勝利成就，但最後導致戰略失敗，在太平洋戰爭中吞下敗仗，這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的絕佳例證，也證明不要用過往戰略來遂行當前戰役的重要性。

對馬戰鬼

日本取得對馬海峽作戰優勢，引起歐洲列強及美國關注。日本達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促使羅斯福總統帶頭進行和平談判，並於1905年9月5日簽

署《樸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雖然羅斯福因這些成果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其並非全無私心——其實他是想限制日本在遠東擴張版圖。⁴

大多數人認為俄國反而從和平談判中獲利。1905年，《紐約時報》針對樸茨茅斯和談做出相關報導：「一個國家在這場戰爭中每戰必敗、遭對手澈底擊敗——一支部隊被俘，另一支部隊慘遭擊潰，海軍在海上被橫掃一空，但卻可向戰勝國提出和談條件。」⁵ 此外，由於華爾街銀行家資助日本作戰，因此日本須向美國償還戰爭債。從歷史上來看，談判結果對日本不利。日本不但沒有獲得俄國戰



爭賠款，反而花費將近十年時間，利用在中國東北獲得的領土償還其戰爭債務。⁶ 許多日本人覺得深受羅斯福欺騙，使他們無法獲得戰爭賠款，對美國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日俄戰爭勝利促使日本軍方領導人在1941年對美宣戰。事實證明，對馬海戰的記憶烙印在日本軍方領導人腦海，為日本在二戰中埋下禍根——使日本自以為可以在海戰中擊敗任何國家。此外，1940年昭和時代，宣揚日本帝國主義及擴張主義的日本軍方領導人，為失去和平找到代罪羔羊，他們認為，1905年明治時代的領導人，簽署不平等和約，損害日本國家利益。⁷ 昭和時代軍方領導人支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日本作為圈內工業強國，理當領導亞洲並消除西方在區域內的影響力。前述軍方領導也認為事先規劃則可達成目標。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獲得壓倒性勝利，加上美國在和談期間，對戰勝國的各種惡劣行徑推波助瀾下，造就日本由海軍主導的戰略。接著，若能扳倒美國海上戰力，就能在後續和談取得主導地位。太平洋戰場將是扭轉乾坤的良機，可以彌補過往政治上錯誤決策，重拾日俄戰爭的勝利果實。經由壓倒性海戰克敵制勝，粉碎對手戰鬥意志。然而，這一次，日本外交官將透過談判，達成比樸茨茅斯更好的和平方案，並確保整個東亞領土安全，讓帝國欣欣向榮。

日本的太平洋觀點

許多學者認為，日本開戰時「並沒有確切的終戰計畫」，甚至稱「在大戰略方面，日本最高領導

階層完全辜負自己的國家」。⁸ 然而，要理解日本為何試圖透過海戰，贏得太平洋戰爭，就必須瞭解日本現況及歷史。

日本須投注資源，才能維持長期經濟發展與充實軍備，而美國卻不願合作。1941年，日本在中南半島站穩腳步後，由於美國石油禁運，日本石油供應量每日銳減12,000噸。⁹ 美國也派兵進駐該地區。以菲律賓為基地的亞洲艦隊(Asiatic Fleet)積極強化攻擊能力，當時世界各地最先進的美國潛艦都前往該地集中部署：39艘現代遠洋潛艦及6艘老式的海岸防禦潛艦。¹⁰ 美陸軍還將五個獨立裝甲營中的兩個營派駐該地區。¹¹ 為了擊退敵機，菲律賓部署陸軍最佳防空部隊——第200海岸砲兵團(200th Coastal Artillery Regiment)。¹² 1941年9月，B-17陸續飛抵該地。¹³ 日本已無路可退，必須在資源耗盡前採取行動。從日本軍方領導人的角度來看，複製過往勝利是一項可行戰略。

二戰時期的日本戰略家從日俄戰爭中深切體悟：「要打赢現代戰爭，科技並非關鍵，而是士氣；而士氣，不僅侷限於軍隊士氣，也包含國家整體士氣。」¹⁴ 日本軍方領導人意識到美國民眾渴望孤立主義，更想避免捲入另一場世界大戰。日本軍方領導人也明白，日軍擊沉兩支俄國艦隊，點燃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革命種子，並迫使俄國坐上談判桌。如果日本能夠在太平洋上複製前述海軍勝利模式，就可能對美國造成巨大傷亡。因為害怕在另一場戰爭中失去美軍性命，從而助長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日本對此了然於心，並將擴大美軍傷亡視為心照不宣的戰略重心。如果日本能夠造成美軍大量傷亡，就能推進和談進程。

日本自知永遠不可能澈底擊敗美國或英國，但又迫切希望能控制海洋，確保石油及橡膠供應無虞，因此計劃在太平洋發動一場有限戰爭，並區分兩個步驟：首先，確保大東亞共榮圈內的資源；其次，鞏固周邊防禦，防護所獲資源，避免盟軍反擊。雖然對美開戰讓人憂心忡忡，但日本軍方領導人認為，攻擊珍珠港會讓美國猝不及防，並為日本爭取時間，鞏固中南半島利益及外圍防護，反制美國反攻。

日本「打算仿倣攻打中國與俄國時的做法，發起太平洋戰爭：限制衝突，並升高物質和道德成本，讓戰爭後果超出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願意承受的範圍」。¹⁵ 藉由製造有限衝突，日本的戰略「不是基於美國的軟弱，而是基於美國的理性」。¹⁶ 日本軍事規劃人員認為，若能殲滅敵軍艦隊，複製對馬海戰的勝利，會迫使富有生意頭腦的美國「計算成本及利益，而接受日本武力造成的現實」，就像1905年俄國一樣。然而，這次日本將可贏得和平談判。¹⁷

最後，日本認為海上決定性勝利會削弱美國戰鬥意志，因為美國戰略家也以海戰勝利為依歸。事實上，日本仿倣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的戰略，深信決定性海戰所扮演的關鍵角色。1935年，海軍大臣大角岑生(Mineo Ōsumi)提出一個問題，說明這個不爭的事實，以支持美國意志可能會因一場決定性海戰挫敗而崩潰的觀點：「有人認為，未來戰爭中，決定性艦隊決戰永遠不會發生，但備受美國戰略家推崇的馬漢上將不是說過，海軍力量的首要目標是在決戰中殲滅敵方艦隊？」¹⁸ 大角認為，如果美國輸掉決定性海戰，它

在戰略上將別無選擇，只能投降。

現實

日本軍方領導人誤判美國人的戰勝意志，根據克勞塞維茨的說法，對手的抵抗程度可以

用兩個不可分割的因素來衡量，即是對手可運用的全部手段及其意志力。對手可運用的全部手段是——雖然並不完全是——一個數字問題，並且應該是可以測量的。但其意志卻難以確定，只能通過激勵意志的動機強度來估算。¹⁹

不幸的是，對於日本而言，華府將太平洋戰場視為一場無限戰爭，並劍指日本政府。美國願意投入所有資源，人民也團結一致，全國上下以戰勝日本為目標。用克勞塞維茨的話來說，就是美國會運用所有作戰手段，而在擊敗日本前，作戰意志是堅不可摧。

從手段的角度來看，「美國海軍具備超乎想像的物質優勢」。²⁰ 美國可以購買與建造比日本更多的艦艇，日本早在1934年就知道自己在造船方面處於劣勢，日本海軍省軍備限制研究委員會(The Japanese Navy Ministry Armament Limitation Research Committee, JNMALRC)指出：「日本每年造船能力為45,000噸，而美國則是80,000噸。」²¹ 1934年，美國造船能力超過日本45%，這意味著日本必須立即使美國失去戰鬥力才有機會獲勝。此外，該委員會雖意識到日本的造船能力處於劣勢，卻嚴重低估美國——美國準備每年建造超過300,000噸的艦艇。當美國國會於1940年6月通



過《文森法》(Vinson Act)，並於同年7月通過《兩洋海軍法》(Two-Ocean Navy Act)。當下，日本就知道它必須迅速行動。前述法案要求美海軍造船噸位要增加11%，因此，1944年，4,500架海軍飛機和130萬噸戰鬥艦須完成建造。²² 此外，戰時緊急命令發布後，造船噸數將會再往上推升，增加3,800萬噸自由輪(Liberty Ship)、750萬噸的勝利輪(Victory Ship)以及1000萬噸T-2油輪以上的造船能量。²³

日本也大為低估美國的意志力。具體而言，「美國不同於中國與俄國，儘管美國經歷經濟大蕭條，但並沒有因為內部問題而削弱軍事實力。戰爭反而使美國擺脫經濟蕭條，政府及民眾都在為勝利而戰」。²⁴ 偷襲珍珠港造成美國仇日，並激發美國人民抗敵意志。1941年12月7日，海爾賽(William Halsey)上將表示：「當這場戰爭結束時，只有在地獄的人才會說日語。」²⁵

對馬海戰續集：難以捉摸的決定性海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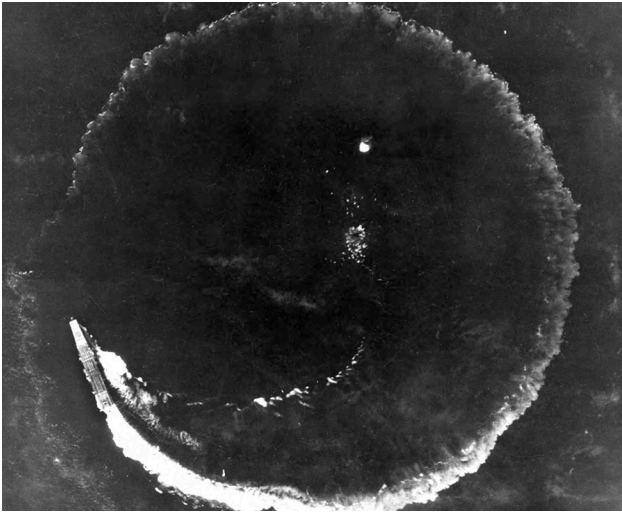
日本帝國海軍「計畫動用戰鬥艦與巡洋艦進行決戰」。²⁶ 日本戰略家堅信，國內軍事科技及優越戰術「將使位居劣勢的日本艦隊在決戰中占有優勢」。²⁷ 珍珠港事件後，山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元帥強調，必須以迅速且決定性的打擊，擊潰美國戰鬥意志，並在1942年4月建議：「海軍應採取主動，不斷打擊敵人……我們要不斷打擊敵人，狠狠攻擊其痛處。」²⁸ 這種決定性海戰勝利的偏執，在三場重大戰役中得到體現：中途島、菲律賓海及雷伊泰灣(Leyte Gulf)。

日本最初規劃於1942年6月在中途島重演對馬

海戰。然而，山本無法以壓倒性力量對抗美國，因此需要另一種戰略。對比雙方在中途島的武力，日本4艘航空母艦與美國3艘航空母艦(加上中途島本身)相當。²⁹ 日本艦隊包括2艘戰鬥艦、2艘重型巡洋艦、1艘輕型巡洋艦、11艘驅逐艦及248架戰機。美軍則有7艘重型巡洋艦、1艘輕型巡洋艦、14艘驅逐艦及360架戰機。兩相比較之下，日本並沒有取得壓倒性戰力。³⁰ 因此，山本擬定以欺敵為基礎的複雜計畫，俾取得決定性勝利。

最終，中途島戰役對雙方而言都不是一場決定性戰役，但它確實讓太平洋武裝力量平衡傾向美國：「日本一次失去6艘一線艦隊航空母艦中的4艘，其影響超出預期。」³¹ 中途島是蒙受戰損的日本海軍所發動之最後一波攻勢。中途島戰役還加速折損日本經驗豐富的海軍飛行員：參與此役的日本航空母艦飛行員有30%陣亡、40%負傷。³² 中途島戰役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³³

儘管在中途島戰役中蒙受戰損，日本帝國海軍並未捨棄最初戰略，因為「直到1944年春天，A-Go計畫仍要求進行決戰」。³⁴ 1944年6月，日本在菲律賓海海戰中發現另一個執行決定性海上打擊，以及實施A-Go計畫的機會。然而，美國已能夠掌控交戰條件，美國飛行員稱此次交戰為「馬里亞納群島射火雞大賽」(Great Marianas Turkey Shoot)，日本空中力量因經驗豐富飛行員大量流失而衰退。³⁵ 這種追求另一場決戰的做法，進一步削弱日本空中力量，因為「日本100架妥善作戰艦載機，在馬里亞納群島射火雞大賽後，減少到50架以下。」³⁶ 菲律賓海海戰也影響日本水面艦隊：日本九艘航空母艦中，只剩兩艘仍



1942年6月4日上午8時許，從中途島基地起飛的美陸軍航空部隊B-17「空中堡壘」(Flying Fortress)轟炸機執行高空轟炸，日本航空母艦蒼龍號(Sōryū)極力迴避，避開炸彈直接命中。(Source: USN)

然適航。³⁷ 日本定義菲律賓海海戰為「決戰」，戰敗後剩下兩個選項：「另一場保衛菲律賓的『決戰』，以及引入神風特攻隊(Kamikaze)這種全新進攻手段。」³⁸

日本帝國海軍仍然堅信決定性海戰戰略，因此籌劃1944年10月雷伊泰灣海戰。為了全力支持這一目標，「日本帝國海軍的全部剩餘戰鬥力都投入雷伊泰灣」。³⁹ 雷伊泰灣戰役被描述為「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關鍵的海戰」。⁴⁰ 諷刺的是，這場海戰是美國取得關鍵勝利，因為日本折損4艘航空母艦、3艘戰鬥艦、9艘巡洋艦及10艘驅逐艦——而且「日本海軍自敗戰後一蹶不振」。⁴¹ 現在，學者將A-Go計畫稱為「災難」。⁴² 日本自始至終盲目追求此戰略，必須深究這種災難性做法背後因素，才能瞭解日本軍方領導人的立論基礎。

認知失調與社會支持

日本軍方領導人相信，40年前對馬海戰的決勝戰略必然奏效。1937年，日本海軍航空本部教育處長大西瀧治郎(Takijirō Ōnishi)就支持「決戰是戰鬥的本質，戰鬥始終以決戰為基礎」的傳統觀點。⁴³ 1940年，日本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Osami Nagano)曾預測，日本將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Micronesian Islands)戰鬥中，與美國進行決戰。⁴⁴ 然而，儘管有明確證據一再顯示，日本無法在決戰中獲勝，但日本軍方領導人仍舊堅持此信念。認知失調理論可以解釋前述現象。

當個人信念與資訊間產生衝突，就會發生「認知失調」。可能導致認知失調的資訊來源包括行為、感受、意見及環境，信念與資訊若產生矛盾，個人就會感到不適，此即為認知失調。提出認知失調理論的心理學家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認為：「如果一個人對事物的認知與內心想法不一致，他就會無所不用其極，讓它們更趨一致。」⁴⁵ 解決認知失調引起的不適有幾種方法：改變個人信念以符合資訊、改變行為以符合個人信念、改變個人對資訊的看法，或者忽略導致認知失調的內心衝突。

此外，即便證據與最初信念產生分歧，信念堅定的團體依然能義無反顧支持彼此。實驗心理學家費斯汀格、瑞肯(Henry Riecken)及夏赫特(Stanley Schachter)證明，社會支持可以解決認知失調，在信念遭到質疑時堅守初衷。前述三位心理學家加入芝加哥「探索者」(Seekers)小型邪教組織，該組織預測世界將在1954年12月21日滅亡，但其成員將會獲救，並乘坐飛碟飛到克拉里



昂星(Clarion)。⁴⁶ 該邪教組織由成年領袖與大學生組成。當世界未如預期滅亡時，返家過聖誕節、脫離團體的大學生放棄自己的信仰，不再嘗試接觸該組織。然而，12月21日晚上聚集在一起的組織成員仍然深信預言，為維護信仰，成員齊唱聖誕歌，剪掉所有衣服上的金屬品，並辭掉工作，其他組織成員則加大招募力度，試圖吸引更多追隨者。⁴⁷ 儘管這個信念有明顯瑕疵，而且多則不實預言所造成的認知失調，本應讓成員背棄原始信念，但因團體形成社會支持，使錯誤信念得以延續。

社會支持同樣使日本軍方領導人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多次戰敗後，仍堅信決戰戰略。根據日本海軍準則內容，日軍憑藉優越海軍戰術即可戰勝美國艦隊，在決定性海戰中取勝，可是這套說法是以陳舊不全的框架為基礎。然而，由於日本軍事領導階層堅信此一信念，且團隊成員熱烈響應，因此敗戰反而讓其更執迷這種信念。這些領導人忽略排山倒海的反證，拒絕改變戰略。這股集體

意識使其堅信，決定性海戰戰略仍會奏效。由於這種認知失調，日本極度渴望決定性勝利，同時再次強化集體信念，「前述種種造成日軍在菲律賓海與雷伊泰灣海戰中慘敗」。⁴⁸ 如果當時日本軍方領導人懂得獨立思考，就可能採取其它方案，例如固守關鍵地區之守勢戰略。

太平洋戰爭早期，發生日本軍事領導階層內部認知失調的一個具體案例。1941年1月7日，山本向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Koshirō Oikawa)提交一份報告，表達對決戰戰略的擔憂。山

本指出：「在過去決定性海戰的兵棋推演中，海軍從未取得勝利，讓大家心服口服，而這類兵棋推演通常在日軍兵力逐步損耗時就嘎然而止。」⁴⁹ 山本的報告明顯是在質疑重演對馬海戰就是勝利之道的普遍信念。然而，山本的想法後續發生變化，他之後提出日本必須「在初期打擊美國艦隊，然後在其行動時予以摧毀」。⁵⁰ 而山本原本因質疑決戰傳統信念所產生的認知失調，就在成為決戰戰略的狂熱支持者後不翼而飛，這可由其籌劃中途島戰役過程中得



1944年6月19日，在菲律賓海海戰「馬里亞納群島射火雞大賽」中，美國海軍預備役弗拉丘(Alexander Vraciu)中尉在列星頓號(USS Lexington)航空母艦飛行甲板上，豎起六根手指，示意他「擊落」六架敵機。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到印證。

山本的例子說明，訴諸決戰戰略不僅是個人認知失調，也是日本集體認知失調，迴避「不可能打敗美國」的殘酷現實。山本指出，兵棋推演常因日軍敗北而中止，這也證明群體層面認知失調。具體來說，日本領導人認為國家具備戰術優勢，可在有限戰爭中迅速擊敗美國。然而，日軍不斷在兵棋推演中失足，也說明這訴諸決戰是一種謬論。為了舒緩認知失調，繼續籌劃戰爭，日本軍方領導直接中止兵棋推演，以避免面對不愉快的事實——攻擊美國並非通往勝利之路。

小林丸

《星艦迷航記》(Star Trek)科幻系列電影的粉絲可能會發現，他們愛好的世界與日本在二戰中的處境有一些相似之處。星艦學院(Starfleet Academy)會對學員進行「小林丸」(Kobayashi Maru)測試。在測試中，參加人員無法取勝，測試目的是幫助星艦軍官面對死亡。一艘名為「小林丸」的運輸船在中立區遇難，學員受命營救該船，而進入中立區屬戰爭行為，敵軍將會摧毀學員所乘坐的艦艇。本質上，星際艦隊學員在「小林丸」測試中毫無贏面：「試圖營救遇難民用船隻船員，自己卻在過程中喪命，或者避免對抗，看著遇難船隻及其船員被俘或被殺。」⁵¹ 值得注意的是，《星艦迷航記》影迷對場景名稱的爭論與日本在太平洋的戰略息息相關——一群粉絲就場景名稱日英字面翻譯，認為這艘大劫難逃的船名應是「小林」(Little Woods)，意謂學員不應為了小利而冒險犯難，將自己性命曝露於風險之中。⁵² 然

而，另外一派粉絲認為，小林丸情景「是以二戰日本飛行員小林道雄(Michio Kobayashi)命名。1942年6月4日，小林在中途島戰役美國航空母艦約克鎮號(Yorktown)攻擊任務中壯烈犧牲」。⁵³

在中途島戰役中，小林官拜海軍中佐，他在飛龍號(Hiryū)航空母艦上負責指揮俯衝轟炸機部隊，而「這艘航空母艦戰力在日軍艦隊名列前茅」。⁵⁴ 雖然當時小林對此並不知情，但當下幾乎束手無策，無法避免部屬或自己命喪戰場。如同星際艦隊學員所面對的必敗局面，小林竭盡所能完成任務，但到了最後，俯衝轟炸機部隊仍註定壯烈成仁，這是一個無法取勝的局面。

或許《星艦迷航記》是在對一位傑出軍官身處無法獲勝狀況表示敬意，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在轟炸珍珠港的那一刻，就已經面臨到自己的小林丸情景。美國並非帝俄，而要取得決定性海戰勝利，迫使華府進行和平談判幾乎不可能。縱使日本可以在中途島戰役中取得如同對馬海戰之勝利，在自身航空母艦毫無折損的情況下，摧毀全數三艘美國航空母艦。1943年6月，美國航空母艦建造能力，也能以近10比1的差距輾壓日本。⁵⁵ 此外，美國人口是日本的兩倍，美國鋼鐵產量是日本的五倍，煤炭產量則是日本的七倍，此外還有大量石油儲備。⁵⁶

美國海戰效能也大幅優於俄國，而且在偷襲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人民就全力投入戰爭。美國不僅可以像在中途島、菲律賓海及雷伊泰灣海戰中擊敗日本，而且還擁有造艦能力優勢——美國不惜冒著多艘艦艇沉沒風險，擊沉一艘日本艦艇。對日本來說，太平洋戰爭毫無勝算，日本已深



陷於小林丸場景。

結論

二戰期間，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遭逢戰略失敗，未來軍方領導人必須從中記取兩個重要教訓。首先，一種戰略在過往戰爭奏效，並不擔保未來還能暢行無阻。1905年，日本在對馬海戰的勝利會名留青史，日本也可為此自豪，舉辦週年慶祝活動。然而，對於日本來說，對馬戰果讓軍事戰略家無法因時制宜，調整心態，在1941年戰爭中贏得

勝利。他們活在過去，奉行一種即使在戰術上執行得當，也可能會失敗的戰略，而美國也有能力彌補艦隊損傷，繼續執行作戰。

其次，瞭解認知失調如何影響個人和團隊決策。領導者遭逢戰略失敗時，必須能夠有所體認、因應調整，不可冥頑不靈，認為瑕疵戰略帶來最終勝利。孫子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⁵⁷ 1941年，日本不瞭解美國，而假設自己正在與1904年俄國有相似信仰的國家作戰。1905年，當第二太

註釋

1.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Operation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1; reprin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84.
2. John W. Steinber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lecture, Naval War College, November 13, 2019.
3. Denis Warner and Peggy Warner, *The Tide at Sunrise: A Histo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New York: Charterhouse, 1974;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2002), 519.
4. D. Clayton James, "American and Japanese Strategies in the Pacific War,"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e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708.
5. Warner and Warner, *The Tide at Sunrise*, 535.
6. Steinber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7. Yoji Koda, "The Russo-Japanese War: Primary Causes of Japanese Succes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58, no. 2 (Spring 2005), 42.
8. Jonathan Parshall, "Midway: Turning Point in the Pacific?" lecture, Naval War College, January 28, 2020.
9. Denis Warner and Peggy Warner, "The Doctrine of Surprise," *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 4, no. 1 (1991), 24.
10. Glen Williford, *Racing the Sunrise: Reinforcing America's Pacific Outposts, 1941-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62-65.
11. Ibid., 76-78.
12. Ibid., 36-37.
13. Ibid., 114.
14. Michael Howard, "The Doctrine of the Offensive," in 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519.
15. Dennis Showalter, "Storm Over the Pacific," in *The Pacific War Companion: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ed. Daniel Marston (Oxford, UK: Osprey, 2005), 27.
16. Ibid.
17. Ibid., 28.
18. Parshall, "Midway."
19.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77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20. Kevin J. Delamer, "Syracuse in the Pacific?" in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at 75: A Retrospective*, ed. Thomas J. Cutl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9), 139.
21. Ken Kotani, "Pearl Harbor," in Marston, *The Pacific War Companion*, 32.
22. Ibid., 33.
23. Delamer, "Syracuse in the Pacific?" 139.
24. S.C.M. Pai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9.
25. Showalter, "Storm Over the Pacific," in Marston, *The Pacific War Companion*, 28.
26. Yoichi Hiram, "Japanese Naval Preparations for World

平洋艦隊在對馬海峽遭擊沉時，沙皇尼古拉二世面臨俄國內叛亂，並受到德國外部壓力，要求結束日俄戰爭。1941年，日本設想美國也會遭逢類似情況。然而，美國卻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一場無限戰爭：人民貢獻物資，共同追求勝利，戮力擊敗日本。換句話說，日本既不瞭解敵人，也不瞭解自己，並未體認美國行事作風與日本所設想的不同，始終抱持錯誤信念。日本軍方領導人的認知失調，更加深日本對於對馬海戰的執念。這些領導人不斷堅守贏得決定性海戰的錯誤戰略，直到日

本不再擁有作戰裝備和部隊後才善罷甘休。

最終，由於日本無法知彼知己，陷入小林丸情景。過去勝利或許可以當作參考，但絕不能據以決定軍事戰略。以馬漢式的遠洋戰役打敗美國是不可能的，儘管有大量反證，日本仍拒絕承認這一事實，不斷堅持錯誤信念，最終吞下苦果。

作者簡介

Michael W. Major 博士是西維吉尼亞大學行銷系助理教授。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 War II,”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44, no. 2 (1991), 66.
27. Ibid., 69.
 28. Ibid., 76.
 29. Parshall, “Midway.”
 30. Ibid.
 31. Donald Chisholm and Kevin J. Delamer, “Battle of Midway,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presentation, Naval War College, June 5, 2012.
 32. Ibid.
 33. Parshall, “Midway.”
 34. David C. Evans and Mark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492.
 35. Ibid.
 36. Douglas Smith, *Carrier Battles: Command Decision in Harm's Wa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3), 74.
 37. Ibid.
 38. H.P. Willmott, “After Midway,” in Marston, *The Pacific War Companion*, 192.
 39. Delamer, “Syracuse in the Pacific?” 145.
 40. David Horner, “General MacArthur’s War,” in Marston, *The Pacific War Companion*, 135.
 41. Ibid.
 42. Hiram, “Japanese Naval Preparations for World War II,” 77.
 43. Ibid., 73.

44. Ibid., 74.
45. Leon Festinger, “Cognitive Dissonance,” *Scientific American* 207, no. 4 (1962), 93.
46. Leon Festinger, Henry Riecken, and Stanley Schachter, *When 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47. Ibid., 198.
48. Evans and Peattie, *Kaigun*, 492.
49. Hiram, “Japanese Naval Preparations for World War II,” 75.
50. Ibid., 76.
51. Gregory Conti and James Caroland, “Embracing the *Kobayashi Maru*: Why You Should Teach Your Students to Cheat,” *IEEE Security & Privacy* 9, no. 4 (2011), 48.
52. 請參見Kiyoshi Daniel Kohatsu, “What Would the Ship Name ‘Kobayashi Maru’ Mean in English? Please Ignore the Star Trek Stuff for This,” *Quora*, November 2, 2019.
53. Ibid.
54. Jonathan B. Parshall and Anthony P. Tully, *Shattered Swor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5), 262.
55. Parshall, “Midway.”
56. Ibid.
57.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 with commentary by Samuel B. Griffith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84.